

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
学习参考资料

第三辑

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代文学组编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

(1937—1949)

毛主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
抗战胜利而斗争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4—
329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 文艺思想斗争

(1937—1949)

毛主席：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

胜利而斗争

抗战前期的文艺思想斗争

- 对“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斗争…………… (1)
- 郭沫若：新文艺的使命…………… (1)
- 〔附录〕
- 梁实秋：与抗战无关…………… (10)
- 沈从文：一般或特殊…………… (12)
- 对《战国》派的斗争…………… (17)
- 洪 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 (17)
- 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 (30)
- 何其芳：文艺的堕落…………… (41)
- 〔附录〕

战国策：本刊启事·····	(45)
陈 铨：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思想（节录）·····	(46)
林同济：寄语中国艺术人·····	(50)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	(57)
毛主席论“民族形式”·····	(58)
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	(61)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	(70)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	(84)
葛一虹：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 “民间形式”吗？·····	(88)

〔附录〕

胡 风：对于五四革命文艺传统的一理解·····	(96)
对于民间文艺的一理解·····	(104)

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及对周扬等的斗争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艺报》编者按语·····	(115)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117)
---------------------------	-------

凯 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	(119)
-----------------------	-------

钟 岸：对《文学与生活漫谈》的再批判·····	(132)
-------------------------	-------

姚文元：——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141)
-------------------------	-------

 以革命者的姿态写的反革命小说

——批判丁玲的《在医院中》·····	(145)
--------------------	-------

〔附录〕

周 扬：文学与生活漫谈

（一）·····	(154)
----------	-------

(二)	(159)
(三)	(163)
王实味：野百合花	(167)
丁 玲：三八节有感	(175)
在医院中	(180)
肖 军：论同志之“爱”与“耐”	(200)
罗 烽：还是杂文的时代	(204)
艾 青：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206)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文艺思想斗争

对肖军的斗争	(209)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肖军问题的决定	(209)
东北文艺协会关于肖军及其《文化报》 所犯错误的结论	(210)
《生活报》社论：斥《文化报》的谬论	(216)
〔附录〕	
肖军：抚今追昔录	(221)
夏夜抄之三	(222)
政、教泛谈	(223)
丑角杂谈	(225)
对胡风“主观论”的斗争	(227)
乔 木：文艺创作与主观	(227)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	(247)
〔附录〕	
胡风：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263)
舒芜：论主观（节录）	(270)

对“第三条道路”的斗争

毛主席：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 (289)

〔附录〕

肖 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 (296)

 中国文艺往哪里走…………… (303)

沈从文：《文艺周刊》编者言…………… (308)

 编后记…………… (314)

对“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斗争

新文艺的使命

——纪念文协五周年——

郭沫若

现代中国是从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的双重衡厄之下挣扎起来，争求着她的独立生存，自由平等的。这努力已经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了。作为中国呼声的新文艺，因而在其发轫上，也就是以反帝反封建的姿态而出现。滥觞期应该溯之于前清末年，虽然当时的先驱者们在其意识上并不十分明确。经过1919年的五四运动，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旗帜的明朗化，新文艺运动乃至整个的文化运动，获得了划时期的胜利，便由叛逆的地位升到了支配的地位。然而随着这新的胜利的到来，却又有新的斗争接踵而至。纯粹的旧封建势力虽然在表面上隐居了，仅仅维系着它那惰性的长老般的存在，然而却有一大部分的幽灵，借尸还魂，不仅穿上了长袍马褂，而且还穿上了西装。它们靠着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默契，因而更兼带着第五纵队的任务。于是新旧文白之争一变而为意识形态之争，其斗争的激烈较之第一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一八”以来日本帝国主义者暴露了狰狞的侵略面孔，民族危机日紧一日，因而国内的一切势力便逐渐缓和了内部的斗争，而一致地集中到了抗日的旗帜之下。在“七七”的前夜，文

艺界有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消，为全国作家大团结准备下了顺利进行的路径。很明显的，这是反帝的号召又恢复了它的全面支持。在反帝斗争中统摄了反封建斗争。由于侵略战争的残忍破坏性，由于民族危机超过了社会属性的自觉，封建残余势力也解除了本身上的部分桎梏，而获得了意识上的一步前进，于是中国的文艺界在抗战的洪波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効。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但这个高潮时代可惜只局限于武汉作战的短暂期间，其后几经迂回曲折，有些组织已在无形中匿迹消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继续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加倍庆贺的事。

然而无论组织的存续如何，中国的作家们是前进了。由于抗战的驱策促进了作家的团结，也促进了全国的团结；由于抗战的驱策更改进了作家的生活方式而觉悟到自己所担负的使命。抗战以前作家生活固有种种的不同，但不少人是超现实的，远远地和中国的社会脱离，和中国的人民大众脱离。旧式的文人株守传统的贵族生活可不用说，新式的意识模糊的文人则大都陶醉于欧美

式的生活方式而成为民族新贵。这理由很简单。中国任何派别的作家都是出身于小有产者，而历史尚短的新文艺是产生于少数近代化了的都市，艺术家脱离都市便会失掉他的生活根据，甚至文艺脱离都市也会失掉它的存在。例如重要的印刷条件，一般的说在抗战以前便未能离开少数都市而独立。文艺作家要“到民间去”，要“到农村中去，”尽管在前是怎样的呼号，而受着种种客观条件的拘束，始终未能够办到。然而抗战以来却一举而实现了。随着北平和天津、上海和南京乃至广州和武汉的相继沦陷，作家们自动地或被动地散布到了四方，近代都市的文化设备也多向后方移动，后方的若干据点便迅速地受了近代化的洗礼，印刷技巧的普及是惊人的事。大后方的城市如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都很迅速地蹶蹶乎达到抗战前某些大城市的水准。这文艺工作者的四布和后方市镇的近代化，便促进了文艺活动的飞跃的发展。战前集中于少数都市的作家们，现在大批地分散到了民间，到了各战区的军营，到了大后方的产业界，到了正待垦辟的边疆，文艺生活和大众生活渐渐打成了一片，作家由生活中得到资源，大众由文艺中得到提炼，这种潜滋默长的交互作用，虽然并不怎么显著，但确是新文艺中的一条主流。

自然，在这种洪涛激浪的澎湃当中总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的声息。起先我们是听见“与抗战无关”的主张，继后又听见“反对作家从政”的高论，再后则是“文艺的贫困”的呼声——叫嚣着自抗战以来只有些田间式的诗歌与文明戏式的话剧。这种种声息，无论出于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都以说教的姿态出现，而且发出这些声息的人又都是不屑和大众生活打成一片的人。民族已经膺受着空前的浩劫，而一二文学教员们却要高喊“与抗战无关，”究竟是何用意；真正令人难解。这声音怕终竟是

因为犯了违背国策的危险吧，早已低弱下去了，然而也并未消灭，或则一改调门变而为“要直接与抗战有关，”或者缩小范围变而为“反对作家从政。”

“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在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做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那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期间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发出这种议论的先生，既有高才，又有闲暇，与其写文骂人，何不便将满腔的抱负或抑郁，凝结而为美妙的结晶品呢？

说到抗战文艺的品质，我们的看法也略有不同。在五六年来的长期冶炼当中的进展或变更，我们是不能抹杀的。在抗战初期，一般的作家们受着战争的强烈刺激，都显示着异常的激越，而较少平稳的静观，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初期的《抗战文艺》在内容上大抵是直观的、抒情的、性急的、鼓动的，而在形式上，则以诗歌和独幕剧占着优势的地位。但这责任也不能全怪作家，因为一般的读者和工作者也耐不得纾缓。随着战争的长期化，人民情绪渐渐镇定了下来，艰苦的战斗既削弱了廉价的乐观，而成果的批判与胜利条件的检讨也必然导引着作家们回复到本来的静观和反省，使得他们在现实体验既经饱满之后，不得不站在更高一段的据点来加以整理分析、批评、提炼、构成，因而在作品方面便驯致了某种程度的广度、深度、密度的同时增加。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放言“文学的贫困”的人，从好意去解释，大约只是看到抗战初期的情形吧。但有一点是说得最为准确，便是说到

了他自己的“贫困”。战前的那批苍白色的风流不凡，孤芳自赏的文士，自抗战发生后差不多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田间尚有诗，剧作家尚有“文明戏”，而这种说教的人却只有“文学的贫困”而已。

尽管少许逆流在那儿翻波涌浪，中国新文艺思潮的本流始终是磅礴着的，始终是沿着反帝反封建的路线而前进着的。反帝反封建的动向自抗战以来汇合成为抗日的主潮，抗日的思想背景不外是反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与封建思想的私生子，核心是极端排外，极端保守的封建帝国思想，而穿上极端近代化了的武装。日德意都是封建势力未能扬弃而骤然近代化了的国家，其所以流而为法西斯集团，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我们的反帝反封建的文艺思潮之所以很顺畅地转化成为抗日=反法西斯的斗争，也正是历史的必然性所至。这决不是少数人呼风唤雨的力量所可唤起，也决不是少数人的倒行逆施的本领所能改移。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新文艺必须完成其所担负的部分使命，这是民族的铁的意志的发露，任何阻碍都是要把它贯穿的！

由于民族一百年来的努力，中国逐渐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特别是在今年，英美两国继苏联之后宣布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使我们全中国人欢欣鼓舞，获得了葱茏的新生的希望，增加着沸郁的抗敌的勇气。这百年来全民族努力的成果，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而在这之中要认定新文艺运动的若干勋绩，也不能说是纯全出于夸张。但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我们还须得继续奋斗，增进发扬蹈厉的精神，争取自由平等的实质，却也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事理。旧约的废除是历史的成果，也是历史的开端，我们要以今天为基点，继进地创造出更辉煌的历史的篇页。我们所求的不仅是名义上的平等，而是实质上的平等。我们要在政

治、社会、经济、生产、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一切方面。都能够与英美苏三大同盟国并驾齐驱，然后才能够获得民族的解放，更进而分担人类解放的使命。这所加于我们中国人民的责任是很重大，这所加于我们中国作家的责任是尤其重大。

首先，我们神圣的抗战虽已经继续了五年有半，而我们大部分的国土还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大多数的同胞还沉没在水深火热的活地狱中。我们翘首东望，河南一带赤土千里，鲁苏皖浙遍地哀鸿，在连天烽火之中，数百万生灵的号咷振荡着我们的魂魄。这不是纯粹的天灾，这是人祸，这是出于日寇的侵略所酝酿起来的人祸。我们不能不憎恨敌人！但我们对于敌人的憎恨，并未十足地达到灼热的燃烧点，确实是无可否认。我们中国人所受的温柔敦厚之教太深，尤其是大多数的作家依然是沉醉于雅人深致的高蹈，而也有所谓“批评家”者在推波助澜，叫人们要忘记“憎恨”。这是最须得我们警惕的事。宽容敌人等于是杀害自己。这自我杀害比敌人的进攻还要可怕。我们还须得学习，须得加紧学习，学习憎恨，学习极端的对于敌人憎恨。没有极端的憎，没有极端的爱，便没有真正的文艺。没有对于敌寇极端的憎，没有对于祖国极端的爱，也就没有真正的抗战建国的文艺。

同样，我们还须得加紧憎恨伪组织，加紧憎恨汪精卫、王克敏、周佛海、周作人等大大小小的汉奸。他们亲眼看见敌人的残暴，敌人的狰狞，敌人的惨无人道，武力屠戮之外而继之以精神杀害，鸦片、娼妓、桃色文学、官能刺激、举凡一切足以腐烂人的心灵和体魄的毒素，无不用以为武器以残害自己的同胞，而他们不仅视若无睹，反而助桀为虐，为虎作伥，把石敬瑭、张邦昌、秦桧、洪承畴一切民族败类的万恶根性融汇于一身而恬不知耻。这些东西，我们憎恨得他们已经足够了吗？我们是不是还有人在

隐隐替他们原谅？或者可怜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敌人监视之下失掉了自由，或者甚至替他们找出哲理的根据，把他们认为性格悲剧的主人翁，假使是有，是不是对于祖国尽了真诚的爱？这些，我们也并不想专于诘问别人，而是想严烈地诘问自己，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们也值得把这些问题来每天“三省”一下吧。

对于敌伪学到极端的憎恨，对于祖国也就学到了极端的挚爱。我们爱我们的祖国，（被略）要使他从法西斯的毒害之下解放出来，发动他所有的力量消灭法西斯的毒害。我们的抗日圣战已经五年有半了，但我们国家所有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是不是淋漓尽致地动员了起来，用在对于敌伪最无情的击灭上？没有，我们敢说没有。有好些同胞对于国运依然漠不关心，奸商则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大图发其国难财；少数说教的人还在以关心抗战为可耻；这些实在是值得痛心的事。但这应该谁来负责呢？在我们看来，谁都应该负责。国家的事是大家的事，谁都不能脱掉干系！特别是文艺作家们，对于敌伪的憎恨不够，对于国族的关切不够，因而发为文章便不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动员一切，在这一点上，所谓“文学的贫困，”我们是应该有条件地承认的。

自然在作家方面也尽有作家本身的困难，不一定为作家以外的人所能了解。大凡不“贫困”的文学，除掉作家个人的才智和努力之外，总还须得有种种良好的条件凑成，才能够产出。第一它须得有生活上和时间上相当的优裕，其次它须得有写作上和发表上的相当的自由，更其次它还须得有批评家和读者群的善意的鼓励。这些条件在现代的中国作家是具备了吗？很难说。抗战以来一般人的生活都失掉平衡，但在缺乏保障的一点上似乎作家的生活为尤甚。生活高涨了，活动的范围缩小了，稿费实质减低，

版税核算无准，作家即使是钢铁造成的机器也是须得要煤来燃烧的。作家不仅缺乏物质保障，而且还缺乏精神营养。海岸被敌寇封锁，主要的国际路线梗塞，因而与国际文坛失掉密切的联系，作家得不到新鲜的刺激与观摩。交通工具有限，前后方的交互通达困难，作家便只能蛰居在一个范围狭小的地方，虽然处在大时代当中，而所能接触的只是一个小天地，有时比战前还要小，这也是一个精神上的营养不良。

作家生活失却安全的保障，精神食粮缺乏，生活面狭窄，自然难能有所谓“伟大的作品”出现，更加以印刷发行的条件束缚，有作品不易出版，出版后不能满意也不能畅销，这也不失为阻碍精神生产的一种要因。而在写作上又不得多所考虑，在发表上要经过种种的剪裁，一心数用，顾此失彼；这种困难似乎比生活的不安定还要使人感受限制。懂得文艺心理的人，他能知道创作过程是以身心双方的自由为其必要条件的。分外的自由，作家并不敢妄冀，但如希望文艺的发展总宜予以广大的天地而遂其顺畅的成长。譬之树木只要有充分的土壤以吸收养料和水分，只要有广阔的空间以摄取日光和空气，它自然枝叶繁茂而成为盘错的大材；假使人要加以保护，那不外是施肥施水，施针柱以避风雷，施其它必要手续以避虫害，如此而已。但假如要把它种植在花盆里面，更加以种种的拴束修剪，使它成为一定的型，虽然有时也可以娱目畅怀，然而怎样也不会“伟大”起来的。

困难是必得克服的，靠着个人的或个人以上的力量，终究会把它克服。特别是在这1943年的今年，这在各方面应该是阵痛最剧烈的一年，然而也应该是生产较丰富的一年。我们所得到的鼓舞已经不少了。百年来挣扎着的祖国得到了不少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法西斯联盟在欧洲战场已显露败征，苏联的力量愈战愈强，

英美作战到底的决心已屡次宣布于世界，虽然在战略的抉择上有先消灭纳粹，后消灭日寇的步骤，但日寇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必须无条件投降，已成为全民主阵线共同的意向。在这样的情势下边，我们迎接着文协的第五周年，当然不能自己地要更加倍的振奋。我们回顾了正确的来路，我们遥瞻着明朗的前途，文协还有它应该担负的崇高的使命，他的存在与否，他的活动的顺利与否，是新文艺的使命能够完成与否的测验器。我们敬愿克服种种的困难，加紧反法西斯的斗争，增强对于敌伪的憎恨，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促进国家力量的动员，巩固作家团结与民族团结的阵容，以争取民族解放与人类解放的胜利。这些是新文艺所负的使命，也就是文协所应负的使命。我们敬以这些使命的逐步完成来作为对于文协的庆贺。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日。

（选自《沸羹集》）

〔附 录〕

“与抗战无关”

梁实秋

昨天《大公报》副刊载有罗荪先生的一段文字，标题是《与抗战无关》。题目很“新鲜”，所以我看下去了。内容是反驳十二月一日我在本刊所写的一段“编者的话”中的一节。这一节的原文是——“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都没有益处的。”这一节原文也被罗荪先生引录了，但是承他的情，他没有写出我的姓名，只称我为某“先生”“此公”。

罗荪先生对这一节表示了不满，他说我是“正如赌场上的压冷门”而且是“压空了的”。编一个副刊，原来和上赌场可以相提并论，我实在没料到。并且我没有上过赌场，何谓冷门，何谓热门，我也不懂。不过若说我有“投人所好”，那是没有的事；假如我要“投人所好”，我何尝不会写罗荪先生那样的文字？

我已经明白的说“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所以罗荪先生所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要寻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是“不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

的！与抗战有关材料，若要写得好，也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二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衍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

我可以再敬告读者：

（一）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二）于抗战无关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我相信人生中有许多材料可以写，而那些材料不必限于“与抗战有关”的。譬如说吧，在重庆住房子的问题，象是与抗战有关了，然而也不尽然，真感觉到成问题的只是象我们这般不贫不富的人而已。真穷的人不抗战时也是没有房子住的，真富的人现在仍然住的是洋楼大厦，其富丽不下于他们在南京上海的住宅。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但是我现在要声明，罗荪先生的幻想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我（即“此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年前就有自命为左翼作家的一位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荪先生的这一笔，不高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常奉陪。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原载《中央日报》）